

# 1950年5月毛泽东书信探析

## ——以《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的记载为例

王 健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湖南 湘潭 411301)

**摘 要:**根据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950年5月间,毛泽东写下了71封书信。从内容上看,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致以问候;二是答复询问、建议及意见;三是拒绝特殊化的请求;四是鼓励就地安心工作、学习。这些书信与建国初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散发着朴实可贵的亲情,折射着公平正义的光芒,体现出毛泽东认真、务实、高效的作风。这不仅为以后亲友、学友关系的处理确定了标准,也推动了信访工作的全面铺开。

**关键词:**1950年5月;毛泽东;书信

中图分类号:A8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537(2014)03-0048-04

DOI:10.13844/j.cnki.jxddxb.2014.03.011

毛泽东一生写下过数以千计的信函,这些信函既是其科学思想的重要体现,同时又饱含了细腻生动的个人情愫。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毛泽东早年的很多朋友、同学、亲属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倾吐多年未见的思念,有的则要求解决工作和求学,不一而足。这些书信当时大多寄到了专门处理信访工作的机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名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日理万机中,毛泽东总是尽力抽空亲笔回复。他的这部分书信一部分曾在《毛泽东书信选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等中公布于世,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013年12月,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之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推出了《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公布了之前很多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书信。这些书信的公开发表,为我们更进一步地全面、深入研究毛泽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 一、1950年5月毛泽东书信的概况

1.书信的数量。根据现有公布资料,1950年5月,毛泽东一共写下了71封书信。写信的时间

又集中在5月7日(16封)、5月8日(18封)、5月10日(7封)、5月12日(12封)、5月15日(4封)、5月16日(3封),平均一天要写两封信。其中最长的封是5月8日给族叔毛逸民的信,近300字;最短的一封是同日给早年家乡友人蒋端甫的信,仅有不到30个字。

2.写信的对象。根据收信人的身份,主要有四类:一是家乡亲属及友人。如远房叔祖父毛春轩,房叔毛貽华,族叔毛逸民、毛爱桂,房弟毛泽益,房侄毛远悌,姻亲黄谱臣,表兄文润泉、文凯等等。二是烈士家属。如革命烈士林慰的哥哥林谷生、烈士郭亮的妻子李静蓉(李灿英)、革命烈士王基永的妻子龙亦飞等。三是各个时期的同学。如一师同学王汝霖,青少年时的同学余长茂、庄严、文士员等等。四是党内同志。

### 二、1950年5月毛泽东书信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对1950年5月毛泽东所写书信的内容进行统计,大致有四类主题:

一是致以问候。从1927年离开家乡韶山算起,23年已经过去,期间,毛泽东曾试图与家乡亲属、友人通信,但战争年代艰苦的环境隔断了他们

[收稿日期] 2014-04-16

[作者简介] 王健(1980-),男,湖南岳阳人,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研究室主任,图书馆员,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毛泽东生平思想、图书馆研究。

的书信往来。只是到延安,情况较为稳定后,他才和堂兄毛宇居通过1封书信。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得知毛泽东当选国家最高领导人,家乡亲属和早年友人才得以有较多的机会和毛泽东互通音信。在这些书信中,毛泽东通常多向家乡亲属和友人致以问候。

毛泽东十分关心关系较密切的直系亲属和友人近况。比如:5月7日给表兄文润泉的信:“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坨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sup>[1]P128</sup>隔了5天又给另一表兄文南松写信:“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sup>[1]P136</sup>5月15日,写信给邻居邹普勋:“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sup>[1]P140</sup>

对家族中其他亲友的近况,毛泽东也表示极大的关注。比如5月12日给房弟毛泽益的信:“贻全(毛泽东的房叔,毛泽益的父亲)亡故,深致悼意。”<sup>[1]P136</sup>给房侄毛远梯的信:“远翔(毛泽东的房侄,毛远梯的弟弟)略历我忘记了,便时请告我。”<sup>[1]P137</sup>5月8日给姻亲黄谱臣的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sup>[1]P131</sup>

二是答复询问、建议及意见。很多故旧与毛泽东失去音信多年,在得知毛泽东已当选最高领导人后,纷纷写信给毛泽东,打听一些人和事的下落,并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毛泽东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对这些予以答复。如5月8日致信陈峰仙:“齐泰情形不清楚,你可以写信去汉口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询问或可得其梗概。”<sup>[1]P131</sup>5月12日给毛爱桂的信:“令兄爱棠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过一面,以后即未见过。”<sup>[1]P136</sup>5月8日给易克:“教育法令尚多阙如,只能边做边像,故无从寄奉。”<sup>[1]P133</sup>同日给王砺初的信说:“所指工作中的缺点,正在注意纠正,吾兄倘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sup>[1]P133</sup>给曹直明的信:“去年十二月来信并附件收到,感谢你的好意。附件已付卫生部研究。”<sup>[1]P134</sup>5月21日给熊筱蠹的信:“尊著经验谈,已付此间医务机关研究。”<sup>[1]P145</sup>5月22日给黎锦熙的信:“所提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sup>[1]P145</sup>

三是拒绝特殊化的请求。这部分内容的书信

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书信的绝大部分,均是针对亲友、同学、友人提出的解决工作、入学、介绍入党等等特殊化请求。如5月7日复信周振岳:“参加工作尚望就近设法。”<sup>[1]P130</sup>复信李鑫:“工作问题,应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sup>[1]P130</sup>5月8日复信李静蓉:“你在湖南工作很好,如工作需要,不必来北京。”<sup>[1]P131</sup>复信王云晓:“工作问题希望就近设法解决。”<sup>[1]P132</sup>复信毛春轩:“浪秋、迪秋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sup>[1]P132</sup>复信刘忠获:“贵友娄先生有志研究极好。惟来京一事由弟推荐颇有未便,希望他另想办法。”<sup>[1]P133</sup>5月12日复信文南松:“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sup>[1]P135-136</sup>5月16日复信周容:“组织问题,未便率尔介绍,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sup>[1]P141</sup>

四是鼓励就地安心工作、学习。给青少年时的同学余长茂的信:“吾兄从事教育事业是很好的,尚望继续努力。”<sup>[1]P129</sup>给青少年时的同学庄严的信:“吾兄从事教育事业是很好的,希望继续努力。”<sup>[1]P129</sup>给青少年时的同学文士员的信:“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好,尚望努力进修,改进人民教育事业。”<sup>[1]P129</sup>给郭建人的信:“现在人民政府工作甚好,望于工作中加强学习,对于过去有所批判,以期日进有功。”<sup>[1]P132</sup>给青少年时的同学刘庆勋的信:“吾兄从事工业技术是有益的,希望继续努力,为人民利益而服务。”<sup>[1]P132</sup>给原身边工作人员黄滨的信:“你在宁乡工作甚好,希望你努力将工作做好。”<sup>[1]P132</sup>给一师同学薛世纶的信:“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为有益,尚望加强进修,继续努力。”<sup>[1]P134</sup>

从上述内容来看,这一时间段内,毛泽东的书信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 对亲友在体现关爱的同时要求极为严格。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对亲友的爱有着鲜明的革命家特点。从生活上来说,他对亲友的实际困难是十分同情和关注的,并且尽可能从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给予扶助,经常给他们寄钱寄物。如5月12日给房弟毛泽益的信说:“兹寄上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以应急用。”<sup>[1]P136</sup>5月15日给房兄毛宇居的信提到:“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sup>[1]P140</sup>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从旧社

会过来的毛泽东亲友,或多或少也存在一些“一荣俱荣”的思想,因此,毛泽东除了在经济上援助他们,同时还在政治思想上引导他们树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观。他在5月27日给湖南湘乡县县长刘亚南的信中就明确说道:“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们不满。”<sup>[1]P147-148</sup>

2.对烈士家属在生活上关照有加。革命的成功极为不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自己这个革命家庭就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对于烈士家属的困难,毛泽东从情感上有着常人无法感受的共鸣。所以,一般对于烈士家属来信所提的请求,毛泽东都尽力满足,但大的原则仍是要遵循当时国家、地方政府的统一安排。如5月8日在毛逸民的信中说:“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sup>[1]P130</sup>在答复革命烈士王基永的妻子龙亦飞的信中,毛泽东又说道:“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sup>[1]P131</sup>

3.对请求来京、解决工作、要求入学等一般婉拒。在毛泽东收到的来信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要求前来北京,请毛泽东解决工作、读书等事宜。对于这些故旧,毛泽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有着旧谊这层关系而利用自己的职权去为他们解决私人问题。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也根本没有精力一一为他们逐个去解决问题。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内,毛泽东的回信中,像“先生工作问题,似宜就近设法解决”、“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先生工作岗位,似以原地为适宜,不必远游”、“工作问题,请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决”、“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工作事尚望就近

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北京人浮于事,兄来不一定有好处,学习和工作,可就当地谋之”等等这些话,比比皆是。笔者统计了一下,这样的回信达27封之多。语气也比较委婉,一般都是“北京人浮于事”、“难于为助”等。

4.对建议和意见等具体问题都有答复。很多同志友人的来信,也并非要毛泽东解决私人问题,或对党、政府、地方的一些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或询问一些人、事情的下落。对于这类来信,毛泽东在回信时都十分慎重,对这些建议和意见都给予了答复。比如当时的征粮,各地为了完成任务,出现了“左”的现象,对此老百姓反映强烈。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一师的同学王汝霖、粟济世均写信反映了这些情况,这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所以在回信中,毛泽东分别写到:“征粮中出了许多弊病,政府已有令纠正,不知结果究竟如何,便时尚祈详举见告为盼!”<sup>[1]P128</sup>“征粮弊病甚多,政府已有令纠正,未知实际效果如何?”<sup>[1]P129</sup>但是毛泽东在回这类信时也有自己的原则,即不对来信所提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而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出发,给予回复,目的就在于不干扰地方政府的工作,以免地方政府因为执行自己回信中的意见而导致大的整体政策的执行不力。如复信赵浦珠:“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sup>[1]P129</sup>

### 三、1950年5月毛泽东书信的独特之处

本文之所以选择1950年5月这个时间段进行考察,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这个时间段是毛泽东写信十分集中的时期。在短短一个月时间,他亲笔写的书信就达71封之多,这样短的时间写下这么多的书信在毛泽东一生中都是十分罕见的。二是这个时间段中毛泽东所写的信函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有问候、有答复请求、有鼓励工作等等。三是这个时间段毛泽东所写的信函都极富教育意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视同仁、决不搞特殊化等思想。

除了以上所说的一些特点外,这一时期毛泽东书信有着跟以往书信大不同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建国初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在中央与地



方,在领导人与群众之间,需要有着较为顺畅的信息表达、采纳等互动行为。只有这样,中央高层才能更进一步深入地真实了解民情,这就较一般正式的官方信息采集渠道更为自由、灵活。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很多话题都是涉及到地方的征粮、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这些来信能够顺利地到达毛泽东本人手上,所反映的问题能够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本身就说明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民情、舆情的把握是相当开明的,也反映了当时政风的通畅和顺达,标志着人民政府在政权初定情形下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一直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2.为以后亲友、学友关系的处理确定了标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从这一时期的书信来看,他在把握个人友情的同时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确定了把私情与工作、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的标准,为以后处理亲友、学友关系开了好头。

3.推动了信访工作的全面铺开。这一时期书信活动的开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重要,这也与当时中央秘书室的职能发挥密不可分。由此,毛泽东、中共中央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此后的1951年,中央秘书室在充分调查研究后,给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毛泽东于5月16日批示说:“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sup>[2]</sup>此后,全国信访工作的建立和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 四、1950年5月毛泽东书信的教育意义

书信是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示,时间已过去了60多年,当我们今天重读毛泽东的这些书信时,我们仍为其透射出的大公无私、公平正义而折服。

1.书信散发着朴实可贵的亲情。“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虽然从1921年冬天回家动员全家人外出干革命,自己的小家开始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亲情的放弃,相反,这正是他舍小家为大家的一种牺牲奉献。所以,毛泽东对家乡亲友的亲情时时怀抱在

心。在这期间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毛家的亲友还是外家文家,抑或是家乡的邻居,毛泽东在回信中态度都是十分真诚的。正因为不能和这些亲属、乡邻、友人时常在一起,毛泽东便把对他们的关心、思念写在纸上,能从经济上资助的尽力资助,能在精神鼓励的给予鼓励,确实够格能推荐协调的也决不含糊。他力图通过回信这种方式,告诉他们自己并没有因为身居要位而忘记他们,这种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留给后人的是缕缕春风,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朴实,又那么的感人至深。

2.书信折射着公平正义的光芒。就个人生活经历而言,毛泽东既亲身体会过封建社会的封闭、落后、剥削,也饱尝了半殖民社会的屈辱和不公。所以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从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把造福苍生百姓,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正是在带领人民当家作主,建立起人民政权后,毛泽东最为反对和不能容忍的便是损害人民的利益,进而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秩序的平衡。从这点出发,不管是自己本人还是直系亲人、乡邻、朋友,毛泽东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因自己位高权重而凌驾他人之上,也不因乡亲、乡情和友谊而屈从于原则问题,从不搞裙带联系。因而,他的这些书信无处不体现了公平、正义、无私的闪光点,这也是值得后人永远称赞和敬仰的地方。

3.书信体现着毛泽东认真、务实、高效的作风。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建国初的毛泽东政务极为繁忙,私人时间十分有限。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专门抽出时间,坚持亲笔回信,数量多达70余封,充分体现了其一贯以来认真、务实、高效的作风。

#### 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汪红亮